

长江经济带:一种流域经济开发的 依据、历程、问题和模式选择

罗清和, 张 畅

(深圳大学经济学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长江经济带具有以河流为纽带、产业布局呈梯度分布、生态环境紧密联系三个特征,是一种典型的流域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长江经济带的开发与建设历经从自我发展到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四个阶段。然而目前其开发却面临着行政壁垒、生态环境恶化、综合性管理机构缺失、协调体制机制滞后和法律保障不完善等问题。欧洲的莱茵河、多瑙河和美国的田纳西河、密西西比河以及南美洲的亚马逊河等国际流域开发模式的经验与教训,为长江经济带开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要保护与有效利用水资源,加强河道整治与建设,完善河流流域管理机制,培植流域产业带和产业集群以及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创设一种流域经济开发的新模式,应该成为长江经济带开发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长江经济带;流域经济;开发模式

中图分类号:D 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16)06-0090-07

何谓流域经济?学术界见仁见智。有人认为流域经济是以流域为地理界限的区域经济,是以自然流域为单元、以水资源开发为先导和主体的综合性资源开发型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个重要类别^[1]。也有学者认为流域经济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它以江河为通道,以物流为纽带或轴心,通过整合和优化流域内的各种资源而形成具有一定分工协作的经济带^[2]。综合来看,我们认为流域经济可定义为:以水文循环的自然流域为范围,以水资源科学开发为核心,以促进绿色发展、生态平衡和创新驱动为动力,以实现流域经济持续、健康和协调发展为目标,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区域经济。

长江经济带是指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11 个省市的区域,面积约 205 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

过全国的 40%,是中国承上启下、承东启西的核心经济带。长江流域拥有诸多得天独厚的优势,包括丰富的水、矿资源,良好的区位优势,较高程度的城市化与城市集群,扎实的产业基础以及丰富的人力资源等,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然而近年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城镇急剧扩张和大量项目上马,长江经济带却出现了水质退化恶化、湿地面积缩减、森林覆盖率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乡村衰退等问题,其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着严峻挑战。长江经济带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经济体,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其开发的前提和底线,必须加强生态管制和修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原则。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的开发模式,推动其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其对国家经济的支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国外典型流域的开发模式与经验教训,对长江经济带的

收稿日期:2016-10-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经济特区转型与中国模式研究”(13JJD790043)

作者简介:罗清和,深圳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张畅,深圳大学区域经济学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

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产业结构调整、资源优化配置、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重要的启示作用^[9]。

一、长江经济带开发的理论根据

长江经济带属于典型的流域经济,以沿线城市经济体为支撑点,以沿岸水陆交通物流体系为纽带,具有以河流为纽带、产业布局呈梯度分布、生态环境紧密联系等流域经济三个重要特征。长江流域开发的理论依据主要有“增长极”理论、“点—轴—圈”理论、“核心—边缘”理论等。

(一)“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①认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条件较好的少数地区和少数产业带动,应把少数区位优势条件好的地区和产业培育成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主要表现为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向极点聚集;扩散效应则表现为生产要素向外围转移。在区域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极化效应弱化,扩散效应加强,并逐步占主导地位。

长江全流域的增长极是区位优势优越,经济实力雄厚,能辐射流域的部分地区,是流域经济的连接命脉,如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等。长江区域性的增长极是在上、中、下游地区分别占据重要地位,具有较大经济能量,有较高城市群综合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先行者”。其他中等城市以及少数小城市可作为沿线省区内增长极,以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发展优势产业,建设特色城市,加强与中心城市经济联系与互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二)“点—轴—圈”理论

“点—轴”开发理论^②是增长极理论的延伸,“点—轴—圈”理论则是“点—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是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研究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问题。该理论强调“点”(增长极)、“轴”(交通干线)和“圈”(城市群)的作用,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地区的人流和物流迅速增长,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即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并通过“点—

轴”扩散机制的不均衡推动实现区域经济以城市群为中心由近及远的圈层式渐进发展格局^[4]。

长江流域开发适宜采取“点—轴—圈”的开发机制。依托沿江城市这些“点”,促进城市间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和流域协同治理;借助长江这个“轴”及沪瑞、沪蓉运输通道,通过“点—轴”扩散机制实现部分流域地区经济的逐步发展;最后辐射整个流域内城市群这个“圈”,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拓展,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格局,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

(三)“核心—边缘”理论

“核心—边缘”理论^③认为,任何区域都是由核心和边缘两部分组成。核心区域指城市集聚区即经济发达、资本集中、人口密集和科技先进的区域;边缘区域是相对于核心区域各方面较为落后的区域。在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核心区域居主导地位,边缘区域发展依赖核心区域。核心区域通过创新、技术、资本和人才的优势从边缘区域获得发展先机,形成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不平等发展格局。但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的空间结构地位是不断调整的,它们的边界也会发生变化,最终实现区域空间一体化。

长江流域的空间结构符合“核心—边缘”结构模式,这种空间结构特征是极化作用的结果,集聚仍然是长江流域空间结构的主流力量^[5]。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是社会经济活动的聚集区域,流域其他地区则是环绕这三大城市群,在经济、文化、环境等方面受它们的影响。三大城市群早期从外围区吸引大量生产要素,在科技、文化、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尔后这些创新又逐渐向流域其他区域扩散,引导其产业结构转型,进而促进整个流域的发展。

二、长江经济带开发历程

(一)自我发展时期(1979~1989年)

这一时期国家提出以沿江和沿海“T”字形为主轴线的开发模式,把南通、上海、宁波等城市辟为开放城市,上海、苏南等地大力发展乡镇工业与外向型经济,对原有部分工业企业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电子、家用电器、机械、纺织、食品等工业有了较大发展。随着宝钢和仪征化纤等一批大型能源和原材料企业投产,中上游原有的工业基地,包括攀钢、武钢、湖北汽车制造、四川重型机械和电子

工业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提升和扩建,初步形成较强的生产能力。

(二)以开发浦东为主时期(1990~1999年)

长江经济带开发模式从建设重点产业、开发水电、防洪排涝和整治水土转向以港口发展和产业园区建设;从以沿岸主要中心城市为重点开发,转向沿江区域整体开发。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浦东的开发开放和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武汉、芜湖、九江、岳阳、重庆等先后被开辟为对外开放城市,激发了长江沿岸各省市加快发展意愿,各地逐步把发展重点转向长江沿岸地带。

(三)由点到面拓展时期(2000~2013年)

这一时期长江沿岸省市开始重视沿江区域整体开发,重点发展本区域临江城市或地区。上海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江苏从2003年开始正式实施沿江大开发战略,2007年编制《江苏省沿江发展总体规划(2011—2030年)》,提出江苏未来沿江地区将努力建成沿江经济带、沿江城市带、现代化港口群、基础设施网和生态环境宜居区。安徽则提出以加速融入长三角为核心的“东向开发战略”,努力把沿江城市群建设成为对外开放的门户和长江流域重要的新型工业化基地。江西、湖北、湖南、重庆等省市也相继制定本区域沿江开发战略^⑨。

(四)全面上升为国家战略时期(2014年至今)

2014年9月2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及《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标志着长江经济带进入整体推进时期。《规划》提出,将重点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全面推进新型城镇化;增强武汉、长沙、南昌中心城市功能,促进三大城市组团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产业分工协作、城市互动合作;提升重庆、成都中心城市功能和国际化水平,发挥双引擎带动和支撑作用,推进资源整合与一体发展;做大上海、武汉、重庆三大航运中心,发展长江航运;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建设综合立体交通走廊,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整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形成转型升级新的支撑带。

2016年9月,国家批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提出长江经济带四大战略定位: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引领全国转型发展的创新驱动带、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具体为:要把保护和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首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划定生态保护和资源开发红线,建成和谐发展的绿色生态廊道;把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抓手,保持长江水脉畅通,打造黄金水道和先进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把创新驱动作为推动长江经济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在改革创新和发展新动能上做“加法”,在淘汰落后过剩产能上做“减法”,形成优势明显的现代产业走廊;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加强新型城市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等作为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点内容,推动大中小城市结合、东中西地域联动。

三、长江经济带开发面临的问题

(一)流域生态环境压力增大

长江流域受地理区位影响,沿岸及支流有诸多港口及工业城市,这些城市在工业化初期大量承载金属加工、机械、化工等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造成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加上矿产、生物等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破坏。随着产业升级,东部及沿海的高耗能工业和低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在承接这些项目时打破原有生态机制,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并诱发生态危机。从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生态事件来看,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普遍存在竭泽而渔、以邻为壑的短视行为和机会主义倾向,极易引发生态严重破坏的“公地悲剧”。

(二)流域内行政壁垒制约发展

长江流域内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一体化市场体系发育不完善。现行绩效考核制度导致地方主政官员极力追求地方利益最大化,城市之间、省区之间存在较强的非合作博弈,竞争大于合作,地区之间相互排挤的壁垒政策,阻碍要素市场一体化发展。下游长三角地区城市之间存在相互压低地价、降低环境准入等现象。上海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其联系比较紧密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该地区。中上游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产业同质强化了地区之间的行

政壁垒。大中小城市经济与产业结构雷同,中心城市的带动辐射能力不足,中小城市产业发展特色不明显,城市群内部联系较为微弱^[7]。

(三)流域综合管理机构缺失

作为长江流域最具影响力的管理机构,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没有综合管理的法律地位,其他相关部委在长江流域设置的分支机构延续着单一要素管理的思路。涉及到流域具体管理事务,各机构之间存在管理职能交叉。长江水利委员会主要以水资源管理和水行政为中心,协调各种工程和非工程措施开展水利及防洪工作,但无力协调综合性社会经济管理事务,特别是在区域协调方面难有作为。从地方角度看,长江沿岸地区备受当地政府重视,地区之间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缺乏统筹与协调,产生诸多流域性生态环境问题,造成地区之间纠纷不断。

(四)流域协调体制机制滞后

长江流域管理机制是单一部门、单一要素管理方式,条块分割和交叉较严重,区域与部门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这种管理体制在环境与流域发展综合性事务上矛盾突出。大部分区域合作项目难以落实,相关协议亦缺乏约束力。在涉水管理方面,纵向管理部门存在交叉和重叠,往往在有利可图的管理事务上介入过度,而在无利可图的事务上介入不足。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导致众多标准、程序、专项规划和管治政策相互冲突,加深流域治理的困境。

(五)法律法规有待完善

现行长江流域管理主要涉及《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水土保持法》、《防洪法》、《河道管理条例》及地方相关要素管理法规和条例等。这些部门和地方法律法规虽都涉及长江流域的管理,但相互之间存在交叉与矛盾,且分散的法律法规在涉及到具体综合事务处理上可操作性较差,开发管理缺乏综合性法律法规保障。新修订的《水法》虽然规定实行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由于没有相应综合监管机构来执行,因此难以落实^[8]。

四、国际典型流域经济开发 经验与教训

大河流域开发一般具有相似性。因此,总结国外典型流域开发模式,梳理其开发经验与教训,有助于

探索符合长江经济带自身特点的发展新模式。

(一)莱茵河模式

莱茵河模式属于网络开发模式,强调环境保护,开发水资源的同时注重水资源保护,通过推动城市化与科技创新带动流域整体发展。1950年,荷兰、德国、法国、卢森堡、瑞士5国成立莱茵河保护国际委员会(ICPR),共同处理莱茵河污染问题。ICPR定位于流域污染源分布数据的监测,为莱茵河跨区域污染治理法律法规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撑。莱茵河流域经济发展遵循经济空间结构演变规律,优先发展港口城市作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对河道进行整治,开挖人工运河,建造堤坝,使莱茵河航运成为世界上货运密度最大的内陆河流,带动内陆经济持续发展。继而布局航运网,接通河道腹地边缘地区以及联结河道上游地区,形成经济空间网络结构。发展港口及节点城市,形成各自的主导及特色职能和定位,如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等为金融中心,斯特拉斯堡、海牙、波恩为行政中心,科隆为媒体业中心、香水之都和化工中心,埃森、多特蒙德、康斯坦茨为教育中心。各城市之间功能合作互补,城市化率迅速提高。此外,沿岸各国高度重视水电等洁净能源开发与水电设施建设,运用现代科技实现水电站自动化管理。在有效利用资源与环境保护基础上,借助各地区资源禀赋,兴建沿河产业带并以科技创新作为各产业带升级、转移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力^[9]。

(二)多瑙河模式

多瑙河模式属于多中心开发模式,其成功之处在于良好的合作机制、风险管理以及公众参与。多瑙河流域合作依赖《多瑙河保护公约》《水框架指令》以及类似的多边合作协议,流域综合管理机构负责对流域内国家之间的利益进行协调,防止不可预测的冲突。流域层次的合作包括多瑙河委员会以及多瑙河保护国际委员会(ICPDR)等政府间合作机制。不同合作机制功能差异较大,例如多瑙河委员会主要负责流域航运及商贸往来;萨瓦河流域管理综合委员会负责水资源的利用及保护;ICPDR负责流域水资源保护以及相关合作事宜。多元化合作机制能够有效地保证流域管理功能互补和发挥,避免出现管理死角和相互推诿现象。ICPDR于1997年建立多瑙河突发事件预警系统,负责协调多瑙河流域突发事件的处理及响应。预警系统根据多瑙河流域的水质、生态安全阈值以及突发事件的危害性等进行反

应。多瑙河公约要求流域多方主体包括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NGO)以及流域沿岸居民全部参与流域管理的相关工作,公共参与包括建立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公众积极参与以及监督、流域规划及时公开等^[10]。

(三)田纳西模式

田纳西模式属于圈层开发模式,其可取之处在于对流域内自然资源统一管理且高效。田纳西流域管理由具有政府权力的机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董事会(TVA)和具有咨询性质的机构——地区资源管理理事会实行,两个机构相互配合,各司其职。TVA通过航运、防洪和水电三项基本目标的实施,推动环境改善和土地资源利用,并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林业经济,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最终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TVA是流域水资源最高管理机构,行政级别高,且以《田纳西流域管理局法》为依据,保证其职权能够充分行使。地区资源管理理事会由州长代表、受益方代表及地方社区代表组成,广泛征集各利益相关方意见,承担组织协调工作,提供咨询性意见。田纳西流域在开发过程中也曾付出过环境代价,但在TVA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下,不但预留大面积的土地用于生态恢复,还通过调整农业、林业和牧业结构(如将种植棉花改为种植大豆、玉米),实行退耕还林、退耕还牧,提高森林覆盖率和草原面积,有效控制水土流失,同时对采矿区的土地生态进行恢复和治理。通过综合开发与整治,田纳西河流域根治了洪灾,农林牧渔业、工业和旅游业得到迅速发展,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被誉为“田纳西奇迹”^[11]。

(四)密西西比模式

密西西比模式是典型的点轴开发模式,通过统一管理,使城市经济与流域经济互促发展。密西西比河流域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加大城市之间贸易往来,加强城市和城镇之间水上运输联系,使一大批港口城市得以兴起。由于港口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基础设施投入与建设大多集中于此并成为该区域综合性交通枢纽。这些城市利用其周边的矿产资源大力发展工业,钢铁工业迅速发展,促进了铁路的发展,改善了内陆地区的交通状况。随着周边中小城市发展崛起,以港口城市为增长点,建立起干支畅通、标准统一的现代化航运网,连接周边城市与内陆中上游地区,形成“钢铁走廊”等沿河密集型产业带,经济发展迅速向内陆推进。抓住科技创新带来的机遇,及

时升级港口城市等老工业地区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新型制造业及服务业,河道流域经济快速发展。密西西比河流域委员会在经济上完全自主,下设水利、电力、航运和工业发展、财务、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农业和化学发展、森林和野生植物、渔业、旅游等部门,是一个具有官方权力与法律效率但按照民间企业管理的机构。该机构遵循流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理念,对全流域统一规划、灵活管理,提高流域经济发展质量^[12]。

(五)亚马逊模式

亚马逊模式属于增长极开发模式,通过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对外开放促进流域发展。亚马孙河流域有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水源充足,但城市相对稀少。巴西政府成立“亚马逊流域管理局”,在重要发达港口城市建立自由贸易区。通过自由贸易区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国内外资本前来投资办厂,使大量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聚集于此。鼓励东北部干旱区的居民来亚马逊流域开荒定居,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兴建水电站和完善航运交通网络。不幸的是,由于地方政府对亚马逊流域的资源过度开发,忽略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并进,忽视流域可持续发展,致使亚马逊热带雨林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坏,不仅对巴西本土的环境造成影响,如水土流失加剧、生物多样性锐减,而且影响全球气候的变化。目前,巴西政府开始注重流域生态环境保护,通过颁布法律法令,严禁乱砍滥伐,同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为保护亚马逊森林进行财政、科技合作。鼓励各大企业、公司在工业生产的同时注重周边环境的保护^[13]。

五、国际经验对长江经济带开发的借鉴

国际流域开发的经验与教训,对长江经济带更好地实现经济发展、产业升级、环境保护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借鉴。

(一)要保护与利用水资源

从国际大河流域开发的成功经验看,这些流域的梯级水电开发特点凸显,充分挖掘水能优势,不仅可获得巨大的水电能源,而且能取得综合社会效益,及时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首次实施多目标梯级开发,兴建多梯级水电站,为流域城市群工业发展及周边产业带形成提供了强大的能源保障。长江水系航道里程远远

超过田纳西河航道长度,但目前长江航道的运力开发仅占全部运力约十分之一,开发潜力巨大。因此,长江经济带开发可依托“黄金水道”资源优势,根据不同河段的水流特点进行开发利用。发挥长江水运运能大、成本低、能耗少等优势,加快干线航道系统治理,整治浚深下游航道,缓解中上游瓶颈。改善支流通航条件,优化港口功能布局,加强集疏运体系建设,打造畅通、高效、平安、绿色的黄金水道。

(二)加强河道整治建设

美国开发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经验是高度重视对河道治理和建设。密西西比河自然通航条件差,历史上曾是一条多灾多难的“害河”,洪水泛滥、水土流失、航道不畅。为此,罗斯福总统决定实施综合治理与开发工程,成立密西西比河流域管理局,对该流域开发与管理进行全方位布局,保证其健康发展。莱茵河河道整治之前,中下游两岸极易遭受洪涝灾害侵袭,流域内各国纷纷采取建造堤防、修筑堰坝和船闸、开挖人工运河、疏浚河床淤泥等措施,既有效解决了洪水问题,又极大地促进航运业发展。长江航运是长江经济带开发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应建立水利与交通合作机制,把防洪、河道整治与航运发展结合起来,实施统筹管理。推进航道整治和梯级渠化,提高支流航道等级,形成与干线有机衔接的支线网络。加快实施航道整治工程,充分利用航道自然水深条件和信息化技术,进一步提升干线航道通航能力。

(三)完善流域管理机制

国际大河流域都有一个明确且的开发与管理机构。以田纳西河为例,1933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田纳西河流域法案》,成立隶属于联邦政府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VA),其主要职能包括防洪、航运、发电、供水、环境保护、娱乐等方面,对田纳西流域资源统一管理。国家以优惠的经济条件和政策扶持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并通过管理局扶持地方经济发展。TVA既具有政府职能且运行灵活,又具有企业组织的优点,是美国流域统一管理机构典型代表,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流域管理机构。在长江经济带开发过程中,建议设置跨部门和跨区域的流域开发规划、协调与管理机构,整合原分散在各部门的流域管理事宜,改变流域资源管理和污染控制职能交叉与推诿的混乱局面。目前,可考虑由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统一指导和统筹协调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强整个流域水资源、水环境、岸线、航运等方面

的监督管理。

(四)培植流域产业带和产业集群

国外流域开发经验表明,流域开发不仅仅是对于水资源的开发与管理,更重要的是通过利用水资源、岸线资源及其他自然资源促进流域产业集群的形成。产业集群有显著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应,形成集约优势进而推动城市群兴起。如莱茵河流域以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港以及法兰克福等城市为依托,与周边多个中小城市共同组成城市圈,进而发展成为经济轴线的主体,形成世界上最密集城市群和产业带之一。长江经济带开发应根据进入门槛、竞争能力、承载载体、空间尺度等因素,着力打造产业集群,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产业集群的层次,促进其发展。通过对产业布局、城镇建设、区域发展等方面探讨与科学论证,探索以城市为依托,干流为轴线,扩及腹地的点轴面的发展模式,将全流域产业带建设与城市发展联动,即沿岸城市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水陆干线辐射流域腹地,促使流域腹地发展相关配套产业。

(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莱茵河流域开发曾经历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生态保护措施滞后,莱茵河污染严重,被称为“欧洲的下水道”。此后,为改善水质付出了较大成本。长江经济带开发应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长江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必须有效利用市场机制和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建立生态环境联防联控、地区间、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保护和改善水环境,严格治理工业污染、处置城镇污水垃圾、控制农业面源污染^①以及船舶污染;保护和修复水生态,强化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沿江森林保护和生态修复;合理利用水资源,加强水源地特别是饮用水源地保护,优化水资源配置,建立健全防洪减灾体系;有序利用长江岸线资源,合理划分岸线功能。

注:

①“增长极”理论是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首次提出,布代维尔加以拓展。该理论针对稀缺资源特别是资本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强调应更有效率地配置稀缺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参见佩鲁.略论增长极的概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55,1-3.

②“点—轴”开发理论是中国学者陆大道在吸收前人经验基础上,把“点”、“轴”要素结合在同一空间开发范围中,运

用网络分析方法,把国民经济看作由点、轴组成的空间组织形式的理论。参见陆天道.2000年我国工业生产力布局总图的科学基础[J].地理科学,1986,2.

- ③ 美国区域规划专家弗里德曼根据对委内瑞拉区域发展演变特征的研究,系统提出“核心—边缘”理论,试图解释一个区域如何由互不关联、孤立发展,变成彼此联系、发展不平衡,又由极不平衡发展变为相互关联的平衡发展的区域系统。参见 Friedman J R.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 [M].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12-15.

- ④ 农业面源污染是指由沉积物、农药、废料、致病菌等分散污染源引起的对水层、湖泊、河岸、滨岸、大气等生态系统的污染。

参考文献:

- [1] 伍新木,李雪松. 流域开发的外部性及其内部化[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2,(01):21-26.
- [2] 张侃侃,郭文炯. 基于空间特征、过程与机制的流域经济研究[J]. 经济问题,2013,(10):103-108.
- [3] 马静,邓宏兵. 国外典型流域开发模式与经验对长江经济带的启示[J]. 区域经济评论,2016,(02):145-151.
- [4] 涂人猛. 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模式:点轴圈模式[J]. 长江论坛,1994,(02):29-31.
- [5] 邓宏兵. 长江流域空间经济系统的特征研究[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0,(03):277-282.
- [6] 段学军,虞孝感,邹辉. 长江经济带开发构想与发展态势[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5,(10):1621-1629.
- [7] 杨德才,余玮. 制度创新、区域分工协作与长江经济带良性发展——基于国外流域经济带发展经验的思考[J]. 中国发展,2014,(06):80-86.
- [8] 段学军,邹辉,王磊. 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的体制机制探索[J]. 地理科学进展,2015,(11):1377-1387.
- [9] 周刚炎. 莱茵河流域管理的经验和启示[N]. 水利水电快报,2007,(05):28-31.
- [10] 孙博文,李雪松. 国外江河流域协调机制及对我国发展的启示[J]. 区域经济评论,2015,(02):156-160.
- [11] 黄园渐,张雷,程晓凌. 贵州猫跳河与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开发的比较[J]. 资源科学,2011,(08):1462-1468.
- [12] 夏骥,肖永芹. 密西西比河开发经验及对长江流域发展的启示[J]. 重庆社会科学,2006,(05):22-26.

【责任编辑:林莎】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Basis, Course, Problems and Model Choi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River Basin Economy

LUO Qing-he, ZHANG C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518060)

Abstract: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characterized by being connected by rivers, gradient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closely relate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 typical river basin econom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as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rising from self-development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However, currently its development is confronted with problems of administrative barriers, deterior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bsence of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backward coordination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imperfect law guarantee system.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development models of the international basins such as Rhine and the Danube in Europe, Tennessee River and Mississippi Riv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Amazon in South America provide beneficial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o protect and effectively use water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regul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river courses; to improv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river basins; to cultivate the industrial belt and cluster in the basin;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protection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Priority of ecology, green development, joint efforts in large-scale protection, and no extensive development should be the basic principl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words: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y Belt; basin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